

前 言

这本书的书名为《战略家》。首先必须阐明“战略家”此一名词的意义。然则何谓战略家？又必须先了解战略的内涵。概括言之，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行动，一种计划。

战略的起点为思想，对所将面对的未来环境思考如何适应之道，即为战略。战略的终点为行动，能把思想化为行动，战略始不至于沦为空谈。

思想与行动之间又要有一座桥梁，否则就会彼此隔绝，战略遂不能形成整体。此一桥梁即为计划。有计划思想始能落实，始能有体系，始能逐步付之行动。计划乃行动的基础，行动必须接受计划的指导。无计划的行动不特不会有效，而且还可能铸成大错。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知必须思想、行动、计划三位一体，然后才是战略。必须如此，思想始不至于空洞，行动始不至于盲目。因此，从事战略思考的人，拟定战略计划的人，采取战略行动的人，都可称之为战略家。

专以思想为务者自可称之为战略思想家，专以行动为务者则可称之为“将”。从行动的观点来看，战略亦即为“将道”。我国兵圣孙子可能为世界上第一位对将道作理论研究的学者。拟定战略计划的人又应列入哪一类？古代战争比较简单，拟定计划的人往往即为指挥作战的人。换言之，计划与行动均为将的任务。时至近代，业尚分工，计划的作出与执行，遂分别由不同的人来负责。执行者为指挥官，作出者为幕僚。19世纪，欧洲各国普遍设立参谋本部，于是战略计划的作出遂成为参谋本部的专业。这也是世界环境变得日益复杂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负责战略计划的作出的人必然有深入思考能力 ,与专业思想家几乎是难分伯仲。他们又一定能了解行动的指挥 ,否则其计划将成为纸上谈兵。所以他们是既能思考 ,又能计划 ,而且也精通将道。他们虽不被认为是战略思想家或名将 ,但却位于两种专业之间 ,并且也兼有二者之长。

本书在组织上共分十五章 ,前七章所论为我国历史中的战略家 ,其重点放在思想与著作两方面。后八章所论为西方历史中的战略家 ,其内容包括思想、著作、计划、将道各方面 ,可谓应有尽有 ,其中又有两章专论英美的海权思想 ,值得注意。

各章虽各自成一单元 ,彼此似少联系 ,但合而观之 ,又还是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所谓战略家的意义 ,并提供研究战略思想及著作时的参考。

钮先钟

圆园园年 源月 源日

目 录

前 言	员
-----------	---

中国篇

第一章 吴起 孙吴比较	猿
第二章 孙臆 孙子第二	園
第三章 尉繚子 作者与时代	源
第四章 太公与六韬	缘
第五章 曹操与诸葛亮 比较研究	苑
第六章 李卫公问对	怨
第七章 元明清三代战略思想简述	员

西方篇

第八章 克劳塞维茨与孙子	员
第九章 毛奇三不朽	猿
第十章 史里芬与计划	苑
第十一章 马汉 著作与思想	猿
第十二章 近代英国的海权思想	愿
第十三章 富勒 装甲兵之父	園
第十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	園
第十五章 综论西方名将的将道	園

第一章 吴起 孙吴比较

引 言

在我国的军事思想史中,孙子与吴子居于不分伯仲的地位。后世谈兵者往往都是孙吴并称,换言之,他们二人是早已被公认为同一等级的兵学大师的。他们各有著作传世,而且在战国和秦汉时即已流行。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人,曾经指出:“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司马迁是西汉(武帝)人,他在所著《史记》上说:“世俗称师旅者,皆曰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所多有,故不论。”可以证明,孙吴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其著作也同样受到尊重,而非其他兵书所能及。

吴起的军事才能不仅史有记载,而且甚至有过于孙子,尤其是孙子的功业几乎没有详细记载。尉繚子曾作比较如下:“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虽然《孙子》与《吴子》在北宋时一同列入《武经七书》,但到今天,研究孙子的人可以说是遍及中外,但研究吴子的人则少之又少,两者之间简直不成比例。而且孙子之书仍然大致完整无恙,吴子之书则早已残缺不全。

吴子 :其人 其书

吴子名起 ,其一生事迹 ,不仅《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中有扼要的记载 ,而且《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古书中也都可以找到与他有关的资料。所以 ,后世对其生平所能获致的知识 ,的确相当丰富 ,而不像对孙子的生平那样几乎一无所知。

吴起的生卒年大约是公元前 394年生 ,公元前 381年死 ,即分别为周考王元年和周安王二十一年。这是最近的考证。因为其出生已在三家分晋(公元前 376年)之后 ,所以应该算是战国初期的人。他出生在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的一个富有家庭中。卫国是一个小国 ,文化水准较低 ,所以他前往邻近的鲁国求学。鲁国是文化大国 ,孔子故乡 ,他的老师是曾申 ,为孔子弟子曾参(曾子)之孙。所以 ,吴起之学与儒家确有渊源。

吴起在鲁国并不得意 ,直到将近四十岁时 ,由于齐国出兵进攻鲁国 ,鲁君知吴起知兵 ,遂准备命他为将 ,但吴起之妻却是齐国人 ,所以放心不下 ,于是吴起杀妻以明心迹。鲁君终于以吴起为将 ,并大败齐军。吴起立功后立即引起许多人的嫉妒 ,开始攻击他操守有问题 ,例如“母死不葬”、“杀妻求官”等等 ,并且还指出齐国被吴起击败之后 ,必然会想要报仇 ,所以对鲁国的安全将会构成威胁 ,于是鲁君遂不再信任吴起。

吴起知道他在鲁国已再无上进的希望 ,遂离开鲁国 ,前往魏国。此时魏国的君王为魏文侯 ,锐意改革 ,求贤若渴 ,遂使吴起获得一展所长的机会。魏文侯首先向他的宰相李克(悝)征询意见 ,李克认为吴起贪名好色 ,操守的确不太好 ,但以兵法而

论,虽司马穰苴也不一定能胜过他。于是魏文侯遂命吴起为将,带兵进攻秦国,获得连克五城的辉煌战果。以后,吴起就被命为大将,负驻守西河地区的重责。(关于吴起如何受魏文侯的知遇,《吴子》书中另有不同的记载,详见下文。)

公元前361年,即吴起适魏十三年后,魏文侯逝世,吴起仍继续向其子武侯效忠。但此时,魏国遂有很多人向少主进谗言,又由于他屡立战功,声望日隆,于是也就自然产生功高震主的效应。魏武侯对他态度日趋冷淡,吴起遂不自安,终于决定离魏国奔楚。

吴起投奔楚国时,楚悼王正在企图改革,看到吴起不禁大喜过望,遂命他为国相(令尹),负起改革(变法)的重任。这可以说是吴起一生中真正能够大展鸿图的时期。他所采取的政策为:“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养战士,务在强兵。”不久改革即开始生效,于是楚国遂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国威大振。但吴起也引起了楚国贵戚大臣的怨恨,必欲去之而后快。

公元前361年,楚悼王暴卒,以阳城君为首的贵族集团乘机发动政变,吴起终遭杀害。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确认吴起在功业方面是有相当杰出的成就的。从四十岁到六十岁,都在忙于出将入相,然则他有无余暇来著书立说,也就不免大有疑问。但吴起的书在战国及秦汉时即已流行。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吴起的著作四十八篇。

《隋书·经籍志》、《通志·艺文略》,均作《吴起兵法》一卷。宋代晁公武在《读书志》中著录为三卷,并分为《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则均作三卷。宋神宗时所核定的《武经七书》则又分为

上、下两卷,并将《说国》、《变化》两篇的篇名改为《图国》和《应变》。流传到今天的《吴子》都是以《武经七书》为根据,即上、下两卷,各有三篇,全部约五千字。

从今本的内容上来观察,很容易发现这本书有很多的疑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者为四十八篇,而现在所存留者仅为六篇,甚至于在北宋时即已如此。换言之,如果原书确为四十八篇,则现存者应仅为其原有的八分之一,从篇数上来看,实在差异太大。因此,可以断言现存的《吴子》即令不是伪书,也只能算是残书。

现有的内容分为六篇,每篇各有一主题。每篇又分为若干段,每段之前的引语或为“吴子曰”,或为“武侯问”,并无一定的规则。而每段又自成一单位,彼此之间几乎毫无关系可言。所以,严格说来,那不是一本书,而只是一本语录。它不是由一位作者根据其思想和逻辑所独立写成,而只是一种对个人的观念或谈话所留下的记录。

还有一点疑问似乎是过去无人注意的。吴起在魏国用事大部分都是在魏文侯时代,但书中的问对都是“武侯问”,完全没有与文侯谈话的记录,这实在令人有些费解。也许惟一的解释即为在已经佚失的部分中(应该还有四十二篇),会有吴起与魏文侯的对话记录(现存本中只有在《图国》篇之首,曾描述吴起初见文侯的情形)。

武经本把全书分为上、下二卷,每卷三篇,这又多少还是有其逻辑上的理由。上、下两卷是各有其思想焦点,而且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卷是以《图国》为焦点,图者谋也,所以属于国家战略的层面,而其余两篇则居于附属的地位。下卷是以《论将》为焦点,属于军事战略的层面,其他两篇(《应变》与《励士》)则又都与将道有关,可以说是《论将》的延伸。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认知《吴子》之书虽已残缺不全,但所留存部分又还是把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两个层面都包括在内,对于现代战略的研究实不无参考价值。全书内容只是思考或谈话的原始资料,当然缺乏完整的组织和体系,所以,就书论书,自然不足以与《孙子》十三篇相提并论。不过,此种论断又只是指现存的六篇而言,也许吴起的确曾经留下很多有价值的思想遗产,但可惜绝大部分都已经散佚。

作成现存记录的人是谁?似乎不一定是吴起本人,也许是出自其幕僚或门弟子之手,但也可能是后世作者依据传说而假托成书。姚际恒早就认为:“今之六篇,其论肤浅,出于后人之伪托。”关于真伪的问题曾有很多争论,在此不拟详述,但姚际恒认为“其论肤浅”,则有辨正之必要。

仅以现存六篇而论,尤其是《图国》、《论将》两篇,其中有若干观念确为创见,其思想之深入甚至有过于孙子。姚际恒居然以肤浅二字来作概括之论,适足以显示他自己未免太肤浅。

综合言之,《吴子》一书虽已残破不全,而其中也可能有后人伪造部分在内,所以也许不能代表吴起思想的全貌,但其中有若干观念不仅确有创见,而且更能对后世提供非常重要的教训,则又毫无疑问。尤其是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所应重视者不是真伪的考证,而是思想的分析。

目前对中国战略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有过分重视孙子而忽视其他诸子的趋势。诚然,孙子是所谓“兵圣”,其思想值得特别重视,但并非谓中国传统兵家著作中,已无其他应加以深入研究的对象。至少古人都是孙吴并称,所以当大家都在崇拜孙子之际,我们也不应冷落了吴子。

《吴子》卷上

一、《图国》

《吴子》全书中最值得重视的即为其第一篇《图国》,那也代表了《吴子》战略思想的最高境界,实可谓全书的精华。这一篇以叙述吴起首次见魏文侯时的情况为开始。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吴起儒服是暗示其学与儒家的关系,而且也非纯粹的军人,但魏文侯最初对他的态度并不友善,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于是吴起立即作了一番说辞,并终于使文侯感动。其说辞中的警语是: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为吴起的思想核心,表示他重视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平衡,并作总体性的考虑,而不偏重某一方面。所以,其书之首篇名为“图国”,用现代语来表示,即为国家战略的分析。

然则如何图(谋)国?吴起提出其基本方针:“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简言之,教育是第一要务,其目的则为培养全民的亲合力。于是他又提出所谓“四不和”的观念:

- (一)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
- (二)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阵);
- (三)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

(四)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因此,吴起的结论为:“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吴起遂进一步讨论到方法问题。他又提出四个基本观念:

- (一)道者所以反本复始;
- (二)义者所以行事立功;
- (三)谋者所以违害就利;
- (四)要者所以保业守成。

并且特别强调:“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

非常明显,从吴子的书中可以立即感受到其深厚的儒家气息。老夫子不是像他一样地重视“有耻”吗?

吴子对战争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他明白指出胜利含有内在的危险,甚至于可以导致亡国的后果。他提出警告说:“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现在就要讨论到吴子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最具有特色的观念,甚至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古代兵家几乎从未有人注意到战争起因和性质的问题,也许只有吴起为例外,甚至于孙子也应自叹弗如。现在就将吴子的原文引述如下:

吴子曰:凡兵之所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一曰争利,三曰积德恶(恩怨),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

一曰义兵 ,二曰疆(强)兵 ,三曰刚兵 ,四曰暴兵 ,五曰逆兵。
禁暴救乱曰义 ,恃众以伐曰疆 ,因怒兴师曰刚 ,弃礼贪利曰
暴 ,国乱人疲 ,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 ,各有其道。义必
以礼服 ,疆必以谦服 ,刚必以辞服 ,暴必以诈服 ,逆必以
权服。

也许可以说 ,吴起好像是我国古代的克劳塞维茨 ,因为他
这一段文章可以算是一篇简明的“战争论”。首先分析战争的
起因 ;其次对战争分类和定名 ,并对每一类战争的性质作简明的
界定 ;最后再概述对于五种不同的战争 ,应用何种手段(方法)
来加以克服。此种对战争起因和性质所作的分析 ,虽然不免
简略 ,但在中国古人的学术著作中 ,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所以仅凭这一点 ,似乎即足以奠定吴子在战略思想史中的不朽
地位。

《图国》篇到此为止 ,每段都是以“吴子曰”为引语 ,而且就
逻辑来说 ,前后也大致都有连贯的关系。因此 ,这一部分很可
能为吴起所留下的原始资料或遗稿 ,但以下还有三段 ,其内容
则明显地有所差异。

第一段是武侯问曰 :“愿闻治兵 ,料人 ,固国之道。”这是一个
内容非常广大的问题 ,但吴起的回答则只注重一点 :“强国之
君 ,必料其民(人)。”何谓料民 ?用现代语来解释即对于全国人
力作一评估 ,依照其才能加以分类共有五项 :

- (一)民有胆气勇力者。
- (二)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
- (三)能逾高超远 ,轻足远走者。
- (四)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

(五)弃城去守而欲除其丑(羞)者。

这五种人都会奋勇作战,所以是“军之练锐(精锐)”。有这种精兵三千人,则“内出可以决(突)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这是吴起的精兵主义思想在其书中的首次出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决围”和“屠城”的文字,因为足以显示战争形态的演进,和孙吴二子时代背景之不同。孙子在其书中明白指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经过长期的准备,付出重大的成本,而“城不拔”则更是一种灾难。所以孙子非常反对,甚至于厌恶攻城。这当然又与时代背景有关,孙子是春秋后期的人,那时攻城的技术远不如守城的技术,所以,孙子才会认为那是不得已的下策。到吴起的时代,历史已由春秋进入战国,战争形态已有很多改变,而城的攻守也成常见的现象。从吴子所用“屠城”两字看来,即可以想见当时战争的惨烈,简直是惨无人道。

第二段为武侯又问:“愿问陈(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吴子只作了简单的回答:

(一)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

(二)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

(三)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回答虽然简单,但又可以显示吴子深知国内政治基础对国家安全、战争胜负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也证明在这一点上,孙吴二子的思想实不谋而合。

第三段也是《图国》篇的最后一段,所叙述的为一个小故事。魏武侯在与群臣讨论国事时,感觉到群臣都不及他,遂不免有喜色。吴起就引楚庄王为例,向他告诫:“此楚庄王之所忧,而

君说(悦)之,臣窃惧矣。”于是武侯有(惭)色。这段故事与战略思想无关,但可以显示吴起的直言敢谏。不过,也显示武侯不如其父,可能构成吴起终于不得不去魏奔楚的幕后理由。

《图国》篇是吴子全书中最完整的一篇,也是最精彩的一篇,足以代表其对于国家战略的若干创见,可以算是其思想的结晶。

二、《料敌》

《吴子》的第二篇为《料敌》,用现代语来表达即为情报。战略必须以情报为基础,这也表示孙、吴二子所见略同。当时天下已分为七国,而魏国则居于中央位置,四面都受威胁。所以,武侯谓吴起曰:“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

面对诸如此复杂的问题,吴起又应如何作答?他首先概括地提出一个基本观念:“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

孙子曰“先知”,吴子曰“先戒”,他们所重视同样都是那个“先”字。简言之,他们都同样具有未来意识,前瞻导向。二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先戒必须先知,先知的目的即为先戒。若不能先戒,则先知又有何用?

在提出基本观念之后,吴子遂开始解答现实问题,他所采取的方法非常合理,充分表现出其治学的科学精神。吴起首先分别探讨各国的民族性(俗),并分析形成此种民族性的环境和背景,然后再断定各国的民族性对于其军事组织(陈)会造成何种影响。最后,基于此种敌情研判,提出应如何应付的对策。虽然古人文辞是比较简略,不易了解,但其所显示的基本步骤,则可以说与现代战略家所采取的几乎完全一样。

由于全文太长,现在只引述齐国为例来说明吴子的分析步骤:“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这是对齐国民族性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所以,“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这是基于以上的分析,而对齐阵(战斗序列)所作的研判。最后,吴子才提出其对策:“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

对于其他五国,吴子也都逐一作了同样的分析和研判。不要说是在古代,即令在今天,我们对他的思想精密,态度严谨,也都应表示莫大的敬佩。

吴子又提出两种极端的情况:(勇)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圆)有不占而避之者。前者可分八类,后者可分六类。吴子所说的“卜占”并不带有迷信的意味,而只是表示考虑的慎重。他认为有某些情况是应该“击之勿疑”,另有某些情况是应该“避之勿疑”。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既然无疑,也自然不必占卜(不疑何卜)。于是其结论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他的话与孙子所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正是异曲同工,若合符节。

三、《治兵》

这一篇的主题,用现代名词来表示即为“作战”,也就是孙子所谓“用兵”。武侯问:“进兵之道何先?”吴起认为应“先明四轻,二重,一信”的原则。

(一)四轻 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

(二)二重 进有重赏,退有重刑。

(三)一信 行之以信令制远。

只有“四轻”应再略作解释：

一、明知阴阳则地轻马：若能明了地形的险易，则马就可以便于奔驰。

二、刍秣以时，则马轻车：马吃饱了则不会感到车重。

三、膏铜有余则车轻人：车有好的维护，则便于人员驾驶。

四、锋锐甲坚则人轻战：武器精良则人员勇于战斗。

现在就要进入本篇的主题。武侯问：“兵何以为胜？”吴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吴起是精兵主义者，他认为决定因素不是数量，而是“治”，治的意义即为组织，也就是管理。他说：“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则不可当，退则不可追……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吴起又非仅知管理，也同样善于用兵。敢于冒险，强调速决。他指出：“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这一段话真是千古名言，尤其是最后两句对于古今中外的指挥官都是永恒的警告。

这一篇最后一段中，吴子大谈马经，表示他对养马用马之道大有研究，实在令人深感诧异。吴起为何如此重视马？在古代战争中，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马政是否受到重视，对国运的兴衰具有重大影响作用。所以，吴子确实具有远见，他在战国初期即已知马之重要，并预言：“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吴子》卷下

四、《论将》

依照《武经七书》本，《吴子》卷下也是分为三篇，而以《论将第四》为核心，其他两篇则只是这一篇的延伸。卷上以国家战略为主题，而卷下则以军事战略为主题。军事战略的主管就是“将”，所以应首先论将。

孙、吴二子都同样重视将在战略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他们的意见又并非完全一致，而是有同有异，所以，若合而观之，则似乎更能使后世了解先贤将道的精义。

孙子把“将”列入其“五事七计”之中，而且在“主孰有道”之后就立即考虑到“将孰有能”，足以证明孙子认为将在战争中的地位是仅次于主。所以，他说“将者国之辅也”，而且还又说“国之宝也”。

吴子不仅像孙子一样地对“将”表示极端重视，而且更强调将必须是文武全才。他说：“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吴起特别指出，“凡人论将，常观于勇”，但他却认为“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同时他又指出：“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换言之，匹夫之勇反而足以误事。孙吴观点颇为类似，都不过分强调“勇”之重要，这是他们与克劳塞维茨之间的重大差异。

吴子认为“将之所慎”也就是必须注意的因素有五点：

（一）理（管理）——治众如治寡。

(二)备(准备)——出门如见敌。

(三)果(果断)——临敌不怀生。

(四)戒(警戒)——虽克如始战。

(五)约(简单)——法令省而不烦。

此乃吴子所独创的一套原则,非常有系统而富实用价值,足以留传千古。若与孙子的“五德”(智、信、仁、勇、严)相配合,则孙子所言为体,吴子所言为用,可谓相得益彰。

吴子又首创“四机”和“三威”的观念。何谓四机?用现代语来解释:

(一)气机——提高士气,振奋军心。

(二)地机——了解地理,善于利用。

(三)事机——使敌方君臣相怨,上下相咎。

(四)力机——武器精良,士马习战。

所谓“机”者含有机智与机会的意义,良将应能发挥其机智,以捕捉胜机。

何谓“三威”?吴子曰:

(一)鼙鼓金铎所以威耳。

(二)旌旗麾帜所以威目。

(三)禁令刑罚所以威心。

简言之,军事组织必须有良好的指挥通信系统和严格的法令规章,这样始能使全军上下对战略环境不会产生误解,对上级命令能够彻底执行。所以吴子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